

1965年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 参观山西农村“四清”

王扬宗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要 根据档案记录、《竺可桢日记》和《科学报》的有关报道等资料,简略介绍中国科学院于1965年4月和11月两次组织老科学家到山西农村参观“四清”的情况以及他们对于“四清”的认识,并附有两幅历史照片。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知名科学家的冲击,于此可见一斑。

关键词 中国科学院 科学家 “四清” 郭沫若 竺可桢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441(2013)02-0252-05

20世纪6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与“文革”相连,是极左思潮的产物。与此同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脱帽加冕”后不久也趋向极左,知识分子被重新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因此,通过社教运动,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成为社教运动的重要内容。从1964年开始,大批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和工厂,参加阶级斗争和体力劳动的实践,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社会主义教育。这场运动波及科技界,对我国科技事业产生过很大的冲击和影响^①。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1964年至1965年,下放农村参加“四清”的科研人员超过万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纪录。1964年第一批参加农村“四清”的人员有3900余人(其中北京地区各单位人员为3379人),其中有研究员20人、副研究员38人、助理研究员406人、研究实习员2286人、总工程师2人、副总工程师8人、工程师16人、技术员346人、应届大学毕业生750人和研究生35人,分赴山西洪洞、安徽寿县、河南许昌、吉林梨树、辽宁开原、四川三合及郫县等地、上海市郊农村,历时8、9个月。1965年7、8月,第二批参加农村“四清”的科研人员和干部有6155人之多,分赴安徽、山西、河南三省农村。这一批人员中还有不少知名科学家,如化学所代所长柳大纲、动物所副所长朱弘复、北京植物园主任俞德浚、数学所副所长关肇直和声学所副所长马大猷等。第二批下放科研工作者到

收稿日期: 2013-05-21

作者简介: 王扬宗,1964年生,湖北公安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试点专项——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与编撰(项目编号: KACX2-YW-001)

① 据《竺可桢日记》:1965年6月10日“他(指汤寿根,《科学通报》编辑)说因年青[人]怕受批评写文章为了名利,同时四清工作三分之一的年轻人下了乡,所以《通报》和《中国科学》一样,稿源只去年1/3云。”([1],478页)

1966 年 6 至 8 月“文革”正式开始以后,才陆续回到原单位^[2]。

对于年老体弱的科学家,科学院党委决定组织他们到山西参观“四清”运动。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了解目前农村形势和阶级斗争情况,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意义,并借以接触贫下中农增加劳动人民的感情,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促进思想革命化”^[3],即促进他们的思想改造。本文即根据档案、《竺可桢日记》和当时《科学报》的有关报道等资料,简略介绍中国科学院于 1965 年 4 月和 11 月两次组织老科学家到山西农村参观“四清”的情况以及他们对于社教运动的认识。

1 第一批科学家社教运动参观团

1965 年 4 月,中共中国科学院党委,组织了第一批科学家社教运动参观团到山西农村参观社教运动。当时山西洪洞县集中了来自中央和山西省的下放工作队员一万余人,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办公厅、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妇联等工作队。在洪洞县,中国科学院工作队由裴丽生副院长领导,有院干部局、新技术局、自动化所、声学所、力学所和北京天文台等单位的下放干部数百人。

第一批参观团由竺可桢、吴有训副院长和院机关党委副书记张从周带队,实际上由张从周负责。团员包括严济慈、童第周、贝时璋、赵忠尧、汤佩松、曹日昌、李善邦、张宗燧、张宝堃、郑国璋、区嘉炜、陈志强、徐钟济、司幼东、罗焕炎、李传隆、叶毓芬、刘静和、谢蕴贞、关克俭、岳宗、周显道、王宪钿、孙彩虹等,共 26 人。另有随行工作人员、干部和家属 8 人。其中 9 人为一级研究员,包括竺可桢、吴有训两位副院长和严济慈、童第周、贝时璋、赵忠尧、张宗燧、李善邦、汤佩松等知名科学家;另有 9 人为 2 至 4 级研究员,5 位副研究员。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 9 人(6 人为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2 人。这批人员平均年龄 57 岁,不少人年龄大,体质弱,有一些人还患有比较严重的疾病。针对这一情况,院党组制定了对他们“生活宽、学习严”的工作办法。所谓“生活宽”是鉴于他们年老体弱,长期生活在大城市,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因此生活上要适当照顾,每天伙食费为 7 角钱,在当地是比较高的,以防生病等意外。“学习严”就是参观学习上要抓紧,不放松,日程安排得很满,以促进他们的思想改造。

参观团一行于 1965 年 4 月 1 日出发,当月 24 日回京,参观 20 余天。他们先到太原参观了山西社教运动展览会,然后到洪洞县听取了裴丽生副院长对当地“四清”运动的介绍。4 月 4~14 日,他们分成 4 组,分别参观了山西省洪洞县的 4 个公社,科学家们参观了“四清”运动的各种活动,同农村干部举行座谈,和工作队的高研和青年同志座谈心得体会。还访问了贫农家庭,吃了派饭,参加了植树、锄草、种棉花等劳动。一部分科学家还和工作队队员一起同伙食,同住在贫下中农家中,每天参加一晌劳动。这一阶段的活动当时称为“下马观花”。4 月 16~23 日,参观团一行先后参观了杨谈、南柳、贾家庄、大寨 4 个先进单位。听取了当地党支部领导王德合(杨谈)、周明山(南柳)、宋树勋(贾家庄)和陈永贵(大寨)等人的介绍各队的情况和工作经验报告。此阶段的活动又称“走马观花”。在参观期间,科学家们还参观了曲沃县浍河水库、太原工人牛奶场和汾阳杏花村酒厂,并访问了文水县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

“下马观花”是这次活动的重点。各小组先通过“听、看、议、访”，即先听情况介绍，再到村里和参观访问，分组座谈，最后每个人写出参观总结。参观团回京后，还召开了几次总结会，向党团组织报送了总结报告，并于1965年5月22、29日在院机关的学习会议上，由参观团成员介绍个人的观感和体会。大家异口同声，都认为参观很有必要，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们称亲眼看到了四清运动的伟大胜利，增进了与农村的阶级感情，亲身感受到农村群众的知识创造，提高了政治觉悟，衷心拥护党的领导，表示要加强思想改造，政治挂帅，改进思想方法，促进科研工作^①[34]。

2 第二批科学家社教运动参观团

1965年6、7月间，第一批参加“四清”的干部陆续回原单位后不久，第二批下放科研人员和干部即赴山西等地。此次中国科学院工作队以运城为中心。1965年11月，郭沫若院长亲自带领第二批年老体弱的知名专家18人前往山西省农村参观“四清”运动，即以运城为重点。这次参观团的实际负责人是院党委委员李德仲，成员除郭沫若院长外，有施汝为、陈世骧、潘孝硕、秦仁昌、林镕、邓叔群、卞彭、蔡邦华、张文裕、汪德昭、吴仲华、王葆仁、傅承义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学部的徐旭生、钱钟书、张政烺、夏鼐、罗大冈等著名学者。18位参观团员中有10位正副所长；其中一级研究员11人，二级研究员7人；11位全国人大代表，3为全国政协委员。规格之高，超过了第一批。他们于11月19日出发，至12月8日回京，历时19天，参观了山西运城、夏县、曲沃、绛县、闻音、临汾、汾阳、文水共八个县的11个生产大队，并访问了太原市及阳泉市。

第二批科学家的平均年龄是60岁，比第一批还要老。为了照顾好他们，随队带有医生和护理人员。山西省接待的领导和沿途接待的当地干部对这个活动十分重视，一路上对他们在生活上尽心照顾。与第一批参观科学家一样，院党组制定的工作方法还是“生活宽、学习严”。

这批著名科学家在运城“下马观花”8天，听取了运城县委书记葛宜生和中科院社教工作队郁文（院副秘书长）介绍当地“四清”情况，参加了贫下中农及其他积极分子座谈会、群众说理斗争会、放包袱的“四不清”干部座谈会，并组织了访贫问苦等活动，还与中科院工作队中的科研人员进行了座谈。“走马观花”阶段，参观了杨谈、南柳、东鲁、涑阳、贾家庄、大寨等先进生产大队，听取了王传河（模范养猪队员）、张菊香（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樊全学（科学实验先进）、王占奎（农村干部）等农村先进人物的发言，并安排绛县南柳大队书记周明山和闻喜县涑阳村党支部书记、农民棉花专家吴吉昌给参观团做了专场报告。他们还参观了临汾社教运动展览和太原的大寨先进事迹展览。此外，还参观了太原重型机械厂、运城的盐池和化工厂，以及杏花村酒厂等，并参观了晋祠等名胜古迹^[567]。

回京后，除了吴仲华、王葆仁、傅承义、张政烺4人外，其余14位专家都很快提交了参观总结。他们表示经过参加“四清”座谈会，参观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深受教育与鼓舞，对

① 参见《竺可桢日记》1965年4月2日至5月29日（[1] 426~470页）。

干部参加劳动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必须加速自我改造。如物理所所长施汝为说:“以前我以为干部参加劳动主要是知识分子改造思想重要途径,对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来说不那么迫切,其实大谬不然,劳动人民不劳动也容易蜕化变质,后果同样不堪设想。”徐旭生老先生说“我们知识分子体力劳动做得太少了,这很不妥当,今后应去掉劳心劳力的差别。”汪德昭先生说“外出十九天,胜过好多年。……我们衷心感谢党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张文裕先生通过参观农村的阶级斗争,认为科学界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斗争,一不小心就会站到资产阶级那边去,因此应当加倍改造自己。钱钟书先生在题为“几点体会”的思想总结中说“这次在山西看到许多大队如何从无条件中创造出条件,把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我懂得科学研究工作应当纠正‘唯条件论’的倾向,因地制宜,苦干巧干,更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8]

3 参观颂诗及其他

郭沫若院长在参观期间,被科学家们视为走群众路线和有劳动观点的榜样。他一路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带头表态。由于他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沿途不断被当地的领导和群众盛情邀请赋诗题词。他在参观期间的诗作 18 首汇为《大寨行》组诗于 1966 年元旦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其中,《颂大寨》一首写道^[9]:

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
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

也并非诗人的竺可桢副院长在参观期间也诗兴大发,写下了好几首诗。其《贾家寨[庄]生产大队颂》([1] 445 页) 写道:

文水出烈女,汾阳古干城。善恶两条路,自古有斗争。农业为基础,努力生产增。
种瓜拟种棉,阶级泾渭分。搞半机械化,事半功倍成。养猪义有道,春生不冬生。
事事找规律,工作有遵循。改良盐碱土,公社万年青。美兮贾家寨,年年庆丰登。

竺可桢参观大寨时也写了一首《大寨颂》([1] 450 页),回京后于 4 月 28 日修改定稿。这首七律诗写道:

愚公虽有移山志,成事还须待子孙。大寨沟梁尽石砾,十年辛苦变田园。
咬牙酣战狼窝掌,赤手填平虎首墩。不怕天时有水旱,只凭人力转乾坤。

时隔近 50 年之后看,这些著名科学家和大学者用他们不太熟悉的政治语言书写的思想总结和诗作,尽管不乏真诚的对农村农民的赞颂、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拥护和深入锥心的思想反省,但更显而易见的是必须紧跟的被动和无奈。这一类的表态之作,见证了极左年代科学家等知识分子的无助处境。这些名震中外的科学家和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向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学习,与他们一起共同生活,他们的真实感受究竟如何,也许是一个谜。而吴有训、吴仲华、李善邦、张宗燧、张政烺、汤佩松等人在参观期间的表现,或被视为怕脏怕累,或被说成只是对游山玩水、名胜古迹有兴趣,很快就成为他们的罪状。参观活动后不久,“文革”风暴席卷全国,这些著名科学家大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在地,身心备受摧残。参观团的张宗燧、邓叔群、曹日昌、司幼东等著名科学家甚至相继被迫害致死。

郭沫若院长则由此次参观活动与大寨结下了不解之缘。那首《颂大寨》诗,他后来题写过多次^①,还新写了几首歌颂大寨的诗词。但“文革”期间,郭沫若并没有免于灾难,他的两个儿子死于非命。1978年4、5月间,在他行将就木时立下遗嘱“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10]1978年6月12日逝世后不久,他的骨灰遵照遗嘱撒到大寨的梯田之中。一代文豪,竟以大寨“肥田”为归宿。这个结局为那个极端的年代留下了一个吊诡的话题。

参 考 文 献

- 1 樊洪业(主编).竺可桢全集[Z].第17册.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
- 2 王扬宗.不当专家当农民——“文革”前科研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政策与实践[J].科学文化评论,2009,(1):33~67.
- 3 中国科学院“四清”参观团总结[R].北京:中国科学院档案,1965-12-2.
- 4 首批科学家农村社教运动参观归来[J].科学报,1965-05-12:1.
- 5 郭沫若院长率领我院第二批科学家农村社教运动参观团回京[J].科学报,1965-12-25:1~2.
- 6 崔福隆.汾河两岸春意浓——郭沫若院长和我院第二批科学家参观农村社教运动侧记[J].科学报,1965-12-25:3.
- 7 第二批科学家参观“四清”总结报告[R].北京:中国科学院档案,1966-12-2.
- 8 关于组织第二批科学家参观农村“四清”情况汇报[R].北京: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66-12-2.
- 9 郭沫若.颂大寨[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Z].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88.
- 10 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29.

Old Scientists Visited Shanxi Villages in 1965

WANG Yangzo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rchives, the diary of Zhu Kezhen and the reports of *Science News*, the author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old scientists' visits to the rural areas of Shanxi in April and November of 1965. The purpose of the visits is to promote the thought reform of them, causing great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them.

Key word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cientists, socialist education campaign, Kuo Mo-jo, Zhu Ke-zhen

^① 其中一幅赠送给其前秘书黄烈的《颂大寨》行书镜心在2009年拍出了19万元。同年,《大寨行》的第一首《重访晋祠》行书镜心更是由北京瀚海拍卖公司拍出了170余万元的高价。时过境迁这或许是这次参观活动留给世人的主要“遗产”?

1965年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参观山西“四清”



1965年11月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社教运动参观团在山西晋祠文昌宫前合影(前排右2起:张政烺、秦仁昌、吴仲华、夏鼐、潘孝硕、张文裕、林谔、施汝为、罗大冈、卞彭;后排右2起:钱钟书、王葆仁、傅承义、陈世骧、徐旭生、汪德昭、□□、郭沫若、李德仲、蔡邦华;余为陪同和工作人员)



1965年12月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社教运动参观团在山西文水刘胡兰烈士塑像前合影(前排右起:1潘孝硕、3林谔、4蔡邦华、6郭沫若、徐旭生9;中排右起:3吴仲华、4卞彭、5、陈世骧、6王葆仁、8傅承义、9邓叔群、11汪德昭、13、张文裕;后排右起:2张政烺、3施汝为、4夏鼐、5钱钟书、6罗大冈、11秦仁昌;余为陪同和工作人员)

[本版照片由张素芬女士(下图第1排左1)提供]